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黄莹^a, 林金忠^b

(厦门大学 a. 马克思主义学院; b.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马克思独特的方法论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其基本内容为遵循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思维逻辑的演绎,开始于最抽象也最简单的范畴并具体再现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从劳动产品这一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开始,找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史规律相统一的“逻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具有的独特结构及其依据的范畴进行分析,由简单的抽象上升到丰富的具体总体,完整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景。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 方法论; 辩证思维逻辑

中图分类号: F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8)04002409

一、引言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进一步深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历史性任务也随之提上理论研究工作的日程。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所秉承的方法论理应以马克思独特方法论为基础。这一点在我国学界业已形成共识。然而,何谓马克思的方法论,其独特性何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准确的答案。因此,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方法论基础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的独特方法论。

首先应理清的问题是,马克思究竟在其著述的何处论述了他的独特方法论?根据笔者的阅读,在马克思的著述中,论述其独特的方法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形,即松散论述和专门论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有关于方法论的松散论述,马克思这种松散论述,往往是在特定语境下顺便提及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很容易被那些对方法论不甚关注的读者所忽略。例如,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阅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时,便已觉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内在缺陷:其一是源于经验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其二是缺乏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基础。我们可以在该书中读到这样一段精彩论述:“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

收稿日期:20180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分配伦理思想研究”(17CKS001)

作者简介:黄莹,女,湖南湘潭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林金忠,男,福建闽侯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2009:155-156)又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谈到方法论历史视野的问题时写道“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马克思、恩格斯,2009:598)类似于上述的松散论述在马克思著述中随处可见,关注此类论述,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加以领会和把握,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独特方法论。除了这些松散论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关于方法论的专门论述,均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二、马克思独特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关于方法论的专门论述,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思维过程、范畴演绎所遵循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范畴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及其本质规定性的遮蔽。

(一) “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思维过程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阐述了辩证思维的完整过程,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性”,第二条道路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恩格斯,1995:42),后者即是马克思独特方法论所遵循的辩证思维过程。可用图1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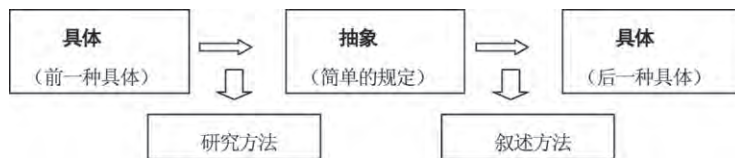


图1 辩证思维逻辑的过程图式

“前一种具体”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马克思、恩格斯,1995:41),是对外部世界最初的认识,因而具有抽象、模糊、离散的规定性,辩证思维始于这一具体,“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1995:41)这里的“抽象”是从客观对象的若干属性中抽出本质属性,在思维中把构成客观对象的局部要素抽出来而产生的概念范畴。这是17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家们探索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它从鲜活的整体出发,从人口、国家等开始,最终在研究中找到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等,亦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

“后一种具体”是通过辩证思维把抽象加以再现的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马克思、恩格斯,1995:42)这一过程即“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这是马克思所探索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最简单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开始,例如以商品分析为起点,首先研究价值、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等“先导”性经济范畴,而后逐渐地延伸出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等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比较具体、核心的经济范畴,直到把整个对象呈现出来。这一道路“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1995:42)。在此,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方法论是把历史当成逻辑思维的自身归纳和

强化的结果,他写道“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1995:42)黑格尔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融入到历史进程中,把历史实在看成概念的运动,这是概念与实在的颠倒。与此正好相反,在马克思看来,“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1995:44)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通过区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精炼而又通俗易懂地阐述了上述辩证思维逻辑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研究方法就是针对具体(前一种具体)到抽象这一过程的方法,是在利用许多关于客观对象实际资料的基础上,人们运用抽象的辩证思维逻辑剥离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提取本质的、共同的东西。叙述方法则是针对抽象到具体(后一种具体)这一过程的方法,它好像是在表达一个“先验结构”,其实是根据研究结论,采用归纳—演绎推理中的演绎手段,把客观事物用理论阐释出来,亦即范畴从简单规定性上升到复杂规定性的过程,生动体现了抽象的规定性在辩证思维逻辑进程中得到具体的再现。

(二) 范畴演绎遵循的基本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辩证思维逻辑乃是方法论的一般性表述,在具体研究中必须转换为文本叙述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范畴间逻辑演绎的思维进路,这种思维进路针对范畴的矛盾转化运动,始于抽象范畴,终于具体范畴,通过辩证思维演绎,使得范畴在丰富的物质世界里得到具体呈现。因此在文本叙述层面上,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逻辑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从最简单的范畴开始。

在马克思那里,最简单的范畴即是最一般、最抽象的范畴。虽然说在思维内部才能确定最简单的范畴,但是却与外部世界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1995:44)也就是说,只有当外部世界处于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或者趋于完满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充分认识并理解最简单的范畴,因而才有可能通过思维得到最抽象和最一般的范畴,即最简单的范畴。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马克思、恩格斯,1995:45)马克思还用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语言来描述这一过程“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生物身上表露的是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为后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1995:47)这意味着用辩证思维逻辑来考察社会发展的历史运动总是具有事后性质的^①,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2004a:93)

(三)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强调辩证思维逻辑的唯物主义基础,恰恰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本质的反对和批判,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方法论原则正是由这一点引申出来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实质是逻辑与历史规律的统一,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逻辑与历史进程相统一、逻辑与历史发展趋势相统一以及逻辑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共时结构相统一(郝戈、荣鑫,2015)。逻辑与客观历史进程相统一主要是指,概念范畴的逻辑顺序是对客观历史事件发生顺序的再现。但是,逻辑与历史进程相统一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或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逻辑也并不是对历史消极被动的反映,而是一种再现性的、能动的反映。“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

^① 值得说明的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已经揭示过辩证思维逻辑的事后性,他写道“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黑格尔,1961:1314)

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1995:42),这句话鲜活地反映了辩证思维的主体能动性。

逻辑与历史进程相统一并不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全部内容,如若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简单归纳理解为逻辑与历史进程及顺序的统一,那么必然无法解释《资本论》三卷之间的总体构成和紧密关系,尤其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实际历史进程中,土地所有权、地租等客观实在早于商品、货币和资本出现,但是在《资本论》研究体系中却是最后出现的概念范畴。实质上,历史发展进程及顺序包含着必然的历史规律,正是在符合特定历史规律条件下,历史进程才表现为特定的历时顺序性,概念范畴的逻辑立足于、起源于和内生于特定历史的实践性的统一,再现了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这正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第二层含义。

在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下出现特定的社会形态,特定的社会形态呈现特定的共时性结构。共时性结构是指特定的社会结构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深刻的、稳定的相互联系和作用(郗戈、荣鑫,2015)。在唯物史的视域中,历史可被理解为历史规律所形成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内在共时结构,概念范畴的逻辑是对历史形成的特定社会共时结构性特征的再现,这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第三层含义,亦即,逻辑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共时结构相统一。纵观《资本论》全三卷,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简单本质,推演到“资本主义流通过程”这一表象,而后再将两者综合为最具体的包含丰富表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这一范畴逻辑演绎体系可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从具有丰富表象的社会总体出发剥离出简单本质,然后再围绕这一简单本质向外扩展,将社会丰富表象一一恢复、紧裹上去,最后重回社会总体。换言之,《资本论》所包含的方法论原则正是逻辑与社会共时结构相统一的体现。

(四) 范畴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及其本质规定性的遮蔽

社会越是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概念范畴的本质规定性越容易被遮蔽。马克思在阐述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写道:“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马克思,2004a:93)。比如,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再到平均利润率,体现的是概念范畴从简单到具体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掩盖了资本剥削关系这一本质规定性。这个道理,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是很难被理解的。马克思在批判所谓“三位一体公式”时曾论及这一点,他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马克思,2004b:925)

经济范畴的本质规定性来自于特定的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范畴的本质规定性之所以在其表现形式上总是会被遮蔽,其主要原因在于:任何一个范畴的本质都是在各种自然物质存在上才取得其规定性的,换言之,范畴的本质规定性是通过范畴的物质存在形式而得到外化展现,从而得到其表现形式的。这意味着范畴的表现形式乃是借助于范畴的物质存在形式而使得范畴的本质规定性得到具体再现,而这种具体再现也就必然地意味着范畴的本质规定性在其表现形式上采取了物质的存在形式,因而显现为种种“物象”或“物化”(Verdinglichung)。正是这种“物化”造成了范畴的本质规定性总是在其表现形式上呈现为某种“遮蔽”乃至“颠倒”,有时往往还以“假象”的面目展现在我们面前。

最常见的“假象”是把范畴的表现形式视为范畴的物质存在形式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比如,资本范畴的本质规定性在生息这一表现形式上,资本被理解为钱本身就会生钱。马克思提到的“土

地成了地租的源泉,资本成了利润的源泉,劳动成了工资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1975:499),所指涉的也正是这个意思。马克思特别指出,在利息这个范畴上,资本取得了生息资本这一表现形式,可是恰恰是利息这个范畴,资本的本质规定性却被彻底遮蔽和物化了。所以他说“在所有这些形式中,最完善的物神是生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1975:500),作为生息资本的资本具有“充分的物化、颠倒和疯狂”(马克思、恩格斯,1975:505)。

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比较中马克思方法论所彰显的独特性

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绝大多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不谈论方法论问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研究和他们的经济理论不涉及方法论问题。更切合实际的说法是:他们的经济理论都体现着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论,可是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属于“方法论不自觉者”。他们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针对一个现象或一个问题,知道该怎么样去研究或解决它,懂得如何运用研究方法,但是他们却始终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研究或解决它,也就是说“方法论不自觉者”实际上正在贯彻着某种方法论,可是他们自己却缺失对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可能蔑视方法论。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仅有极少数经济学者曾注意过方法论问题。最早关注方法论问题的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穆勒写于1836年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一文^①,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假设——演绎”方法。这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实证方法论”。穆勒强调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前提假设,他提出,只要是在真实条件下推演出来的理论,那么在任何情况下理论均是正确的,因而,对前提条件的检验成了对理论检验的关键所在(Mill, 1997)。此外,穆勒还阐发了纳骚·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首次提出的“经济人”基本行为假设。而后,西方经济学家们围绕如何使“实证经济学”实现“价值中立”,打造一门“纯洁的”经济学^②而努力,为此试图在方法论方面进行论证的第一人是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他于1932年发表《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文,对经济学研究的性质和范围进行狭隘界定,用“目的——手段”这一非常简单而狭窄的认识路径,尝试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首次明确地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限定于资源配置问题,把这样一种经济学称为“纯粹经济学”(pure economics)。如果说罗宾斯仅仅是为“纯粹经济学”提供方法论方面论证的话,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则把这一方法论彻底贯穿于其整个理论大厦中。就其研究范围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典型的“资源配置中心论”,其基本做法是通过设置高度简略化的某种万古不变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把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价值观念完全排除在研究之外。而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分析,必须在他们所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然而,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构成根本性影响的乃是弥尔顿·弗里德曼,他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在方法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该文旨在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实证经济学”?何谓“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后者是重点回答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即理论是否正确不在于假设是否现实,而在于理论是否实用,而理论的实用性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预测是否正确,而预测是否正确又与理论假设的现实性是不相关的(弗里德曼,2001)。这个观点,后来被马克·布劳格称为“假设不相关性”(irrelevance of assumptions)命题,该文被赞誉为“战后经济学方法论的中心著作”(Blaug,1992)。但是细读该文不难发现,这个观点本身是不成立的,至少是靠不住的。究竟在

^① 该文收入他的文集《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初版于1844年)。

^② 西方经济学家把实证经济学视为“纯洁的”经济学,试图摆脱经济学研究中涉及到的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价值观念,实现“价值中立”(林金忠,2007)。

什么条件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经济理论的假设可以是不相关的,弗里德曼始终没有对其进行充分论证。他甚至敷衍地说,不现实的假设“大部分地”是不相关的。在笔者看来,“假设不相关”的中心思想体现在理论是否正确取决于理论能否有效预测未来的“实用性”,而非理论的假设,这难免带有“方法论工具主义”色彩。

不难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抽象的“假设”出发,是缺失历史视野的。他们总是把当下的社会制度视为给定的,甚至视为永恒的。比如资本范畴,西方主流经济学因为缺乏历史观,显然是把资本视为一个永恒范畴,仿佛自人类来到地球那一刻起,便有了资本。马克思曾经讥讽他们:“随便什么样的自然存在物都可以是资本,‘把劳动能力称作工人的资本’,‘眼睛的实体是视力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1995:250)连“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1995:213)。而马克思方法论则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具有宽广而深刻的历史视野。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把经济范畴的本质规定性归结为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因此,他总是在经济现象的背后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总是见物不见人。马克思曾经这样批评他们:“把表现在物中的一些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马克思、恩格斯,1982:56)

通过仔细研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是一位非常注重方法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于自己理论中所贯彻的方法论有着极为高度的自觉。马克思的方法论通过辩证思维逻辑的演绎,从抽象到具体,层层再现了经济现象的本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往往停留于事物的表面,极不重视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是全神贯注于现象本身的描述和分析,甚至把一切经济现象都归结为数量上的技术性关系,可以用数学来表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劳动价值时充分暴露了这一弊端:“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末,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斯密,1972:42)马克思批评他们说:“按照某种类比任意把一切东西拉扯在一起……把极不同类的东西混为一谈。”(马克思、恩格斯,1995:250)

四、马克思方法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打造所谓“纯粹经济学”的名目下,实则脱离历史视野的实证方法论相比较,马克思独特的方法论才是真正适合作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如前文所述,正是因为经济范畴的本质规定性被遮蔽的缘故,才使得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思维逻辑显得尤为重要。辩证思维逻辑的演绎开始于最抽象也最简单的范畴,在其本质层面上使最抽象也最简单的范畴得到思维的具体再现。通过这一过程,受外部世界发展程度的限制而被遮蔽的范畴的本质规定性也就随之得到了消解,于是我们才能够获得事物及其变化的真相和本质。按照这些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叙述逻辑上做了非常细致的分篇,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的末尾写道:“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

界市场和危机。”(马克思、恩格斯,1995:50)虽然,在此处马克思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联系前文所阐述的马克思的独特方法论,从中获得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点启示。

第一,马克思独特方法论的精髓体现在基于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逻辑,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最简单亦最抽象的范畴开始,通过辩证思维逻辑的演绎,在其本质层面上使概念范畴得到思维的具体再现。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从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开始,即,从劳动产品这一范畴开始。为何是劳动产品而不是商品?我们可以在《资本论》中找到答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2004a:8),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2004a:47),物质财富的“元素形式”正是表现为单个的商品,即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马克思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进行生产,具有商品形式,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即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因而,商品能够成为研究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的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商品形式已经消亡,劳动产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最基本的“细胞形式”,所以对社会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研究只能从劳动产品这一最基本最抽象的范畴开始。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外,还存在许多非公有制形式,物质生产不可避免地采取商品的形式,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商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

第二,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这一逻辑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历史发展趋势相统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逻辑进程应能动地反映和再现历史,去除历史中偶然性因素和表象方面,抓住历史进程的实质阶段和必然性。更为重要的是,逻辑进程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形成的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内在共时结构相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实践道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和趋势中出现的特定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拥有特定的共时性结构,既具有特定社会时代的特性,又是先前历史的产物。例如,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会产生政治,但是到共产主义社会政治将要消亡,而中国道路所代表的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即仍然存在商品和资本、政治并没有消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不过,与资本逻辑统治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保障的政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逻辑必须遵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本质扩展为表象的方法论原则,具体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最为根本也最为重要的内在结构和深层联系。曹典顺(2017)提出的中国化的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经济逻辑,即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和政治建设的哲学依据,亦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价值相统一的实践逻辑,所指涉的正是这个意思。

第三,根据分篇的第二条,马克思是从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组成其内部结构所依据的范畴逻辑进行论述的,受此启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具有的独特结构及其依据的范畴进行分析。例如,从我国目前生产资料所有制特点的分析着手,才能从基础性和本质层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并存,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化实际,以及形成了与二元化相对应的经济社会特征,并且对我国社会经济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目前我国出现的许多改革之前未曾有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原则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均根源于这种二元化的经济制度,因而也必须从此处寻找解决办法(吴宣恭,2017)。即必须从

我国出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二元化实际出发,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生产关系,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二元化的经济制度和结构要求我们改变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分开阐述、互不联系的模式,在论述时应注意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共同发展又相互竞争、存在矛盾的关系。二元化的制度模式是马克思所未曾预想到的却是有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彻底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前者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后者的核心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强调的是基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中国特色”(张宇,20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因此,借鉴马克思“第二条道路”的推演路径,由简单的抽象上升到丰富的具体总体,在系统地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并对其进行一系列理论抽象和加工,形成科学的概念、判断和推论等,深刻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严密丰富的理论体系。更为具体地说,分析经过40年的经济改革实践确立的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逐渐考虑建立在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之后逐步将中国经济实践放置全球化背景下,将经济运行的范围扩大到国际市场,全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景。

五、结论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层面上有两个内在缺陷,即源于经验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以及缺乏一个正确的历史观,与此相比,马克思方法论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得以彰显。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独特方法论为基础,即遵循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思维逻辑的演绎,开始于最抽象也最简单的范畴并使其被遮蔽的本质规定性得以具体再现。

按照马克思独特的方法论原则,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从劳动产品这一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开始,遵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本质扩展为表象的方法论原则,找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史规律相统一的“逻辑”,即逻辑进程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内在共时性结构相统一,具体地、能动地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最为本质也最为重要的内在结构和深层联系,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具有的独特结构及其依据的概念范畴进行分析,由简单的抽象上升到丰富的具体总体,完整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全景。

[本文系厦门大学教改教法研究项目“提高研究生对思想政治课论课获得感的对策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为例”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到厦门大学校长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揭示及其政治经济学分析”(T2013221020)与厦门大学“双一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 曹典顺,20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意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
弗里德曼,2001.《弗里德曼文萃》,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黑格尔,1961.《法哲学原理·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 林金忠 2007 《“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学术月刊》第5期。
- 马克思 2004a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04b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19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19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吴宣恭 2017 《从实际出发正视矛盾分析根源探索规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郝戈、荣鑫 2015 《重新理解“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中心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
- 亚当·斯密,1972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宇 20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经济研究》第5期。
- Blaug,1992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ll,1836 “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 in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4, Routledge / Thoemmes Press.

[责任编辑: 叶颖玫]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UANG Ying^a, LIN Jin-zhong^b

(a. School of Marxism, b.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lack of historical vision and empirical methodology of modern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Marx's unique methodology is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lso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logic and history and a thinking path in the category of deduction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It begins with the most abstract and simplest category and reproduces the essential stipulation that is obscured. According to Marx's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we should start with the simplest and most abstract category of labor products and find the logic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rical rule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construct the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also need to analyze the unique structure and basi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From simple abstraction to rich and concrete whole, we can completely reproduce the panoramic vie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 methodology, dialectical thinking logic